

文史苑

(二)

- 秋瑾在虹口
- 邮政大楼的白旗
- 能人办学在麦伦
- 信谊药厂与鲍国昌
- 蒋介石与史迪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虹口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左翼作家聯
盟遺址
中華藝術大
學遺址

左翼作家聯
盟遺址
中華藝術大
學遺址



目 录

邮政大楼的白旗	陶振复 沈立行 (1)
上海大厦今昔	徐明朝 (6)
八十年前的上海	顾执中 (10)
塘沽路史迹	张志成 (14)
信谊药厂与鲍国昌	卫元声 (18)
秋瑾在虹口	袁义勤 (30)
虹口区文化史话之二	以 勤 (34)
“能人办学”在麦伦	蔡寿春 (41)
麦伦中学的“推广事业”	陈承融 (51)
虹口的教会学校	柯 震 (56)
关于何世楨和持志大学	胡道静 刘同葆 (61)
上海大学琐忆	宋桂煌 (64)
任中敏办汉民中学	赖纪云 (69)
“三考”进《申报》	毛 士 (75)
老报人话当年	义 勤 (80)
忆华东新闻学院	丁剑华 (83)
粤剧在上海的发轫	柯施恩 张德亮 (93)
百年前的“上海游乐园”	毛 飞 (98)
艺苑忆旧	丁 芝 (100)
虹口公园的过去和现在	姜 烈 (103)

一张珍贵的照片	刘公默 (108)
登庐山访“美庐”	赵朴 (110)
蒋介石与史迪威	张令澳 (113)
我所知道的陶百川	潘湛钧 (125)
往事偶拾——蒋经国在东北	张令澳 (130)
回忆“团干校”	杨燕廷 (135)
胡适先生二三事	钱可亭 (137)
从“孤岛”到罗芳桥	吴抡 (140)
海内外	本刊记者 (145)
虹口区民革简况	(149)
虹口区民建略历	(152)

邮政大楼的白旗

——追念王裕光同志

陶振复 口述 沈立行 整理

上海市第四届政协常委、上海市民革常委、原上海邮电管理局副局长王裕光同志，是知名的民主人士和邮电事业专家，不幸于1968年9月21日被“四人帮”迫害致死。1978年12月19日，上海邮电管理局为王裕光公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隆重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在追悼会上，王裕光的大儿子王永福，以万分沉痛的心情，代表家属发言，他说：

没有骨灰的“骨灰盒”

“在这灵堂里，放在我们大家面前的是一个没有骨灰的骨灰盒，举行着一个没有骨灰的骨灰安放仪式。这个没有骨灰的骨灰盒，本身就是林彪、‘四人帮’对父亲残酷迫害的见证，它是血的控诉！”

当这阵凄惨的声音在追悼会大厅内回荡时，与会者无不热泪盈眶，暗暗抽泣。

王裕光同志去了！今天来追念他，我要回忆他耿耿忠心五十年，为中国邮电事业作出的贡献，尤其是他在上海解放时，冒险促使盘踞在四川路桥北堍邮政大楼内顽抗的国民党军队放下武器，挂出白旗，呕心沥血地费尽了心机。

王裕光1902年生于上海，他没有显赫的学历，高中毕业

后年方十八岁，就考进了帝国主义者把持的邮政局。他勤勤恳恳，忘我工作，历经八年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担任了上海邮政局副局长。他毫无裙带关系，全凭“行伍出身”，从科员、科长、帮办直至副局长，在国民党官场中可谓罕见。

从1920年考进邮局到1968年被迫致死的近五十年中，王裕光耗尽毕生精力，要将邮电事业办好。解放前，他有一个经常放在案头的座右铭：“刻苦耐劳励己，诚实光明待人”。解放后，他感激共产党知遇之恩，又以十六个字自勉：

“老老实实、勤勤恳恳、高高兴兴、服服贴贴”。及至六十年代，他已年逾花甲，但他常说：“我老了，但还想为上海邮政办些好事。一个季度办一件好事，办不成，就半年办一件，半年不行，一年总要办成。”他对邮政事业的建树，从小到大，难以尽述。例如，提高投递效率，普设家庭信箱，建立邮筒准时开箱制度，设置流动邮车，开办报刊发行，全力消灭死信等等。

在消灭死信方面，可以举一个有趣的例子：解放初期，有一次他发现一封从苏北寄来的死信，收信地址写的是“上海老猴子路”。王裕光和邮递员一起推敲，忽然想到：苏北话称猴子为猢猻，“老猢猻路”会不会是“劳勃生路”呢？此路早就改为“长寿路”了，于是试递。果然救活了这封死信。王裕光事后说：“大批摘掉文盲帽子的家庭妇女，解放后参加工作。昔日的王张氏，今天已变成了纺织女工王秀英。她们刚刚学会写信看报，有时难免把信封写错了。”

更令人怀念的是，他在临解放时所作出的卓越贡献。1949年上海解放前，他就和邮电系统的地下党组织建立了关系。地下党戴孝忠同志，和王共事多年，对王的为人，深为

钦佩。他们几经商讨，终于组成了“护局委员会”，由王担任主任，从而使地下党的戴孝忠、奚顺等同志，得到掩护，可以公开活动。“护局委员会”下设消防、纠察、救护三个大队。与此同时，地下党还成立了半公开的“邮电工工人联合会”，在王裕光的掩护下，发展会员，出版油印报纸，动员群众，迎接解放。

“瓷器店里打老鼠”

1949年5月25日，国民党青年军二〇五师一个搜索营，强行进驻四川路桥北堍的邮政大楼，企图顽抗到底（此外，如“上海大厦”等也由交警总队占领）。同时，苏州河南均已解放，但人民解放军严格执行陈毅司令员提出的“瓷器店里打老鼠”的战术，既要消灭敌人，又不能用大炮轰击。此时，王裕光领导“护局委员会”全体同志已经坚持留在邮政大楼，已有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了！他眼睛布满血丝，被军队挤到钟楼或过道内办公，当他得知苏州河以南已经解放时，就用电话和上海代理市长赵祖康同志联系。赵在电话里传达了军管会的命令：“敌军最迟必须在5月26日下午4时前，挂出白旗，缴械投降，否则，解放军就要总攻！”王裕光立即用内线电话和敌军赖营长通话，苦口婆心，劝他投降。但这位营长顽固不化，还死命要和团部取得联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空气凝固了那么紧张，王裕光做通了敌军两个连长的工作，但敌营长就是不肯投降。此时，离开四点只有半小时了，燃眉之急，刻不容缓！王裕光已将个人安危，抛之脑后，和“护局委员会”的杨玉林同志等，冒险进入敌营长办公室，两个投降的敌连长一同前去。这位湖南口音的赖营长，正拼命向团部接电话，但无回音，

敌人早溜了！营长用力摔掉电话机，敲着脑袋，大声说：“我被出卖了！”事不宜迟，王裕光一面向敌营长晓以大义，一面看看手表，已是三点五十五分了，就立即暗示杨玉林等，快挂白旗。

白床单充白旗

杨玉林向室内一看，并无白布，但情急生智，就将敌营长单人床的白床单抽出，冒险推开窗户，将白布飘扬，并高声大喊：“投降了！投降了！”接着二人拿来竹杆，将白布胡乱结扎，就高高伸出窗外，此时刚好正四点钟！南岸的解放军看到白旗，就不再打枪，敌营长垂头丧气，也点头投降了，不费一兵一卒，就凭王裕光、杨玉林等同志的智慧，终于避免了一场浩劫！王裕光立刻用电话和赵祖康联系，赵在电话中说：做好一切准备，傍晚时刻，由军管会联络员刘光辉同志来受降。不久，刘光辉同志率领十多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跨过四川路桥，向邮政大楼走来，王裕光、杨玉林等同志和敌营长、连长等迎上前去，鼓掌欢迎。邮政大楼获得解放，终于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由于邮政大楼的解放，使盘踞在“上海大厦”的敌军，也接着挂出白旗，苏州河以北，至此完全脱出敌人魔掌。

由于王裕光同志和“护局委员会”全体同志的努力，全部财产、档案、汽车、邮艇等等，全都有条不紊地移交给军管会。党和政府没有忘记王裕光同志的功绩，一直非常信任他，让他担任上海邮电管理局副局长之职，直至1968年9月21日被“四人帮”迫害至死为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王裕光同志即受到猛烈冲击，“四人帮”污蔑他是所谓“邮政系统反革命潜伏特务集团

的头目”。抄家后，就在1968年9月9日被隔离审查。王裕光同志正气凛然，绝不屈服，但他那时却未看出这是“四人帮”的阴谋，在受尽凌辱和折磨以后，终于在9月21日，被迫害致死！事后“四人帮”匆忙地毁尸灭迹，不许家人见最后一面，就将骨灰随便掩埋，这才形成了“没有骨灰的骨灰盒”。王裕光同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写下了绝命书，字字血泪令人不忍卒读！绝命书中说到在压力之下，被迫“编了一些假话，……如果说出来，又怕大家认为我又一次翻案，因此又不敢说，……我相信，是真是假最后一定能弄清楚的，但我爱面子，怕斗争，我顶不住了，我经不起考验。……我也对不起我的家属们，……我的爱人是善良的、无辜的，希望能区别对待，不要难为她。”

上海大厦今昔

徐 明 朝

在旧上海，矗立在外白渡桥北堍的“凸”字形建筑——当年的百老汇大厦，是仅次于上海国际饭店的高楼，地面总高度达78.3米，共22层。占地5225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4,596平方米，设有255间（套）客房。它建成迄今已有54个年头了。

大厦落成

英商安利洋行所属的业广地产公司创设于1888年。开创之初，规模不大，它的产业绝大部分在苏州河以北地带，这一带当时大都是一些坟地、河浜，地价极廉。该公司在这里兴建了三千多幢店面和里弄房屋，赚了不少钱。

1929年，业广公司筹划在外白渡桥北堍，在北苏州路和百老汇路（今大名路）的夹角处兴建一幢高楼大厦。他们在此选址，主要考虑到这里面对外滩的高楼建筑群，与旧上海的商业金融中心相距咫尺之遥，可以获得丰厚之利，占有地理上的优势。该公司董事会作出决定，英国著名建筑师弗雷泽设计，由英国人墨菲任监工，由华商新顺记、久记等6家营造厂承包建造，于1930年初动工，到1934年上半年落成，同年10月开始对外营业。

大厦定名为百老汇大厦(Broadway Mansion Hotel)，投资总额为法币540万元，相当于500万两白银。通过发行

公司债券的方式进行集资。聘请外籍人士担任管理工作，采用欧美的经营方式，招徕顾客，吸引了不少外国住户，如英国友邦银行的经理、美亚保险公司的老板、大美晚报的主编、一些外滩的洋行、银行的经理和高级职员等，长期包房住在这里。它的18层楼曾开设过赌场，每天输赢高达万元之巨，成为洋人巨子的销金窟。

沦陷时期

开业还不到三年，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从此，日军便在上海处处打击英、美、法等国在华的利益，百老汇大厦也成了日本要攫夺的一块肥肉。日军曾几次三番向业广公司购买产权，起先业广不同意，日方恼羞成怒，采取强硬手段，派兵武力封锁迫使百老汇大厦一度停业。迫于形势，业广公司遂于1939年3月25日仅以510万“储备票”的代价将百老汇大厦售与日本国策公司上海恒产株式会社。于是，百老汇大厦从英国人手里易主到日本人手中，距开业仅4年半。

日军占有百老汇大厦后，把它变成了武装侵略中国在上海的大本营之一。日军的高级将领、使领馆人员、汪伪政府的官员经常在这里活动。日本驻沪最高当局——“兴亚院”的一些重要官员长住于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以此为据点，四出搜刮五金器材和废铜烂铁，转运日本，制成武器，屠杀中国人民。百老汇大厦自身也难逃厄运，锅炉、水汀暖气片、金属设备等被拆除一空，运往日本制造枪炮。

抗日战争胜利后，百老汇大厦以敌产名义，由国民党政府接收，成为国民党励志社的第七招待所，住进了美国军事顾问团，成了USA的天下，连大门也由美国宪兵把守，中国

人不得其门而入。

黎明之前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挥戈南下，美军顾问团在百老汇大厦耽不下去了，不得不全部撤回华盛顿。在这曙光即将来临之际，百老汇大厦几乎又经历了一场枪林弹雨的洗劫。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在即，国民党7374部队盘踞了大厦。妄图凭借居高临下的优势负隅顽抗，在每层楼的窗口架起了机枪火力，气焰十分嚣张。

5月25日，苏州河南岸已全部解放，盘踞在大厦里的国民党残军已成瓮中之鳖。他们一面穷凶极恶地向外面胡乱打枪，一面收拾行装准备逃命。挨到第二天晚上，在解放军和工人纠察队的政治攻势下，眼看已无法顽抗下去，就和四川北路邮政大楼的残敌一起放下武器，向人民解放军举起白旗投降。百老汇大厦于此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解放以后

百老汇大厦经历了英国人、日本人和国民党人的掌管，当它刚满15岁时，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解放后，它成了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际处的所在地，经过整顿和装修，面目一新，于1951年国际劳动节，正式改名为上海大厦(Shanghai Mansion)。

在这里，周恩来、刘少奇、陈毅、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曾接待过不少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成为我国与友好国家增进友谊的场所。当他们登上大厦18层平台极目远眺，全市景色尽收眼底。著名社会活动家郭沫若曾两次登临，留下诗

篇，其中一首即兴七绝是：

登上天梯十八重，
汪洋上海鼓东风。
春申水涨铺银浪，
万顷楼台映日红。

在四害横行的年代，上海大厦曾遭受严重的摧残，一些用来装潢的艺术品被砸得精光，色彩绚丽的墙壁被涂成红色。最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四人帮及其打手们成为它的座上客，在这里尽情享受，他们大吃大喝之余，每人每次仅付钱二角！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步子的加快，上海大厦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开了新的步伐。对现有客房、餐厅和大厅进行了有步骤的改造，增添了先进的空调设备、高级音响设施和闭路电视系统，改装了一批中式、美式、英式、法式、阿拉伯帝王式的高级套房，开办了酒吧、舞厅、弹子房等娱乐设施；与此同时，对各种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外语培训，力求大厦在接待宾客的服务水平上达到新的高度。

上海大厦奉行“宾客至上，服务至上，礼貌第一，整洁第一”的服务宗旨，在1987年全市旅游饭店服务竞赛中荣登榜首，被评为优胜单位，捧回了奖杯。

大厦的淮扬菜蜚声中外，独具“浓而不膩，原汁原味”的特色，中外人士品尝后称赞说：“淮扬菜名不虚传”。

八十年前的上海

顾 执 中

〔编者按：新闻界老前辈、原上海民治新闻学院院长顾执中先生，今年适逢九十华诞；应本刊之请，慨然允诺撰稿一篇，忆述本世纪初上海的前尘旧事，弥足珍贵。我们谨祝顾老康宁长寿！〕

我在七岁时，随父母从浦东周浦镇（那时浦东不属于上海市）坐小木船渡过黄浦江到上海。我今年进入了九十岁，屈指一算，这事距今已有八十三年了。

那时的上海，分成三个区域，即：英帝国主义者霸占的英租界（后来称为公共租界），法帝国主义者霸占的法租界和中国自己的土地南市与闸北。“租界”是中国人自己称它的名词，实际上并不是什么“租”，而是被侵占，所以公共租界英文称谓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即“国际殖民地”；法租界称为French Concession，即“法属的割让地”，岂不可耻。

英租界占上海的北区，其南以洋泾浜为界。这洋泾浜东通黄浦江，西抵八仙桥，是一条细长的小河；不久，被填没了，变成一条宽阔的马路，称为爱多亚路，解放后改称延安东路。其北则越过苏州河，一部分直抵火车站（即上海北站），车站前的那条路，即称为界路（今天目东路），与华界闸北接壤，折而东，进入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从此一直向北、向东，北抵虹口公园，东占杨树浦的大片区域，抵

达宝山县境。至于法租界，北邻英租界，南邻南市，其东部狭长，无可发展，它只能一直往西扩张，直到沪西郊区。

管理英租界的市政机构，英文是Municipal Council，即“市政委员会”，中文却称为“工部局”。其统治上海的公安局，称为“巡捕房”，其警察则称为“巡捕”。在福州路河南路转角者称为“中央巡捕房”，在南京路贵州路者称为“老闸捕房”。此外还有“新闸捕房”、“虹口捕房”、“杨树浦捕房”等。那时英国的殖民地遍天下，对于侵略，积有丰富的经验。它在上海，以英格兰人作为统治的核心，次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再次为白俄和印度人，最后才轮到中国巡捕和中国“包打听”（即侦探）。至于虹口北区一带，则为日本势力范围。

八十三年前，我家初到上海时，上海尚未有电灯，更无电车，商店都用煤气灯。我家住在河南路苏州路的高福里（今已不存在）时，浙江路铁桥正在兴建，三年未成，却跌死了几个工人。苏州河旁处处堆满筑路用的砂石，居民稀少，十分冷静。我们一家四口住在楼上前楼，只有一板之隔的后楼则住着一个名叫杨藻槎的苏州说书人。他每天半夜二时才回来，当他回家走近苏州河路时，时闻呱呱的“鬼叫”声，吓得他魂不附体，回得家来乱喊乱叫，时时惊醒我们一家人的睡梦。

福建路桥当时是木建的，两旁有木头栏杆。当年，苏州河每逢端午节有龙舟竞赛，有一年端午，许多人拥在桥上观看龙舟竞渡时，不料木栏杆突然折断，有三十余人坠入水中，援救不及，都惨死了，成为一场悲剧。从此以后，新的福建路桥，即老闸桥，改筑成水泥的，再未发生这样的惨祸。

不久，浙江路铁桥造成，铺上与道路相接的铁轨行驶

有轨电车。当初，因电车不设车棚，行车时乘客可以任意跳上跳下，有不少人因此跌伤，甚至摔死。几年以后，我父亲也曾因跳车而跌伤了腿，过后伤虽好，行路却跛了。不久，电车终于在车头装了铁棚，由司机或售票员在开车和停车时负责启闭，才避免了乘客在行车中任意跳车而发生危险。不久，电灯装起来了，马车逐渐绝迹，小汽车开始盛行。从此，上海一步步进入了都市的时代。

根据当时英国禁娼的规定，上海“长三”、“么二”等妓院里的妓女，英国人一律称之为“歌女”（Sing-Song Girl），不承认是妓女。那时这种妓女外出酬应时，骑在男佣人的肩上，后来则改坐包车（即自备黄包车）了。

那时上海的火警特别多，往往一夜之间有五、六处火烧，最使人难忘的是一次福州路福建路转角的一家茶楼失火，因火势大难以扑灭，延及四邻商店，损失巨大。我虽年幼，印象极深。后在夜间听到邻近喊火烧时，不禁为之战慄。

英国巡捕和印度巡捕是很残酷野蛮的，动不动对行人拳打脚踢，尤其对黄包车夫和小贩等，肆意打，打得头破血流也不管，令人感到可恨。中国是他们的半殖民地，可以横行不法，在英国本土则温温柔柔，哪敢如此？他们这种野蛮的举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历史上著名的“五卅惨案”，激起全上海中国人的悲愤，举行了伟大的罢工、罢课、罢市运动，长达一个多月，迫使帝国主义者终于屈服为止。

由于英国人感到势单力孤，有些独力难支，于是设法拉拢美国人，在工部局董事中聘请美国人，例如后来工部局的董事长费信悖，就是一个较有政治头脑的美国人，也拉拢了

一些中国资本家如虞洽卿等担任华董。英国人对一些居住在虹口的日本人和驻扎在虹口公园附近的日本宪兵，也十分畏惧，遇到有什么事件发生，常常低头屈服。

我在1919年毕业于教会办的东吴大学二附中，行将升入苏州东吴大学深造，我父亲忽然患病，我再无力继续求学，只好就业，以工资收入维持家庭生活。前任景林中学校长兼《时报》记者，后担任民治新闻学院校长和《新闻报》记者，就此奠定了一生从事新闻事业的基础。回忆前尘，悠然如梦，退休多暇，书此以志不忘。